



民俗学卷

鍾敬文文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钟敬文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2

ISBN 7-5336-3274-5

I. 钟... II. 钟... III. ①钟敬文—文集②民俗学—中国—文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4331 号

责任编辑:黄书权

装帧设计:包云鹂 朱 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插页:2

印 张:22.75

字 数:500 000

版 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 000

定 价:41.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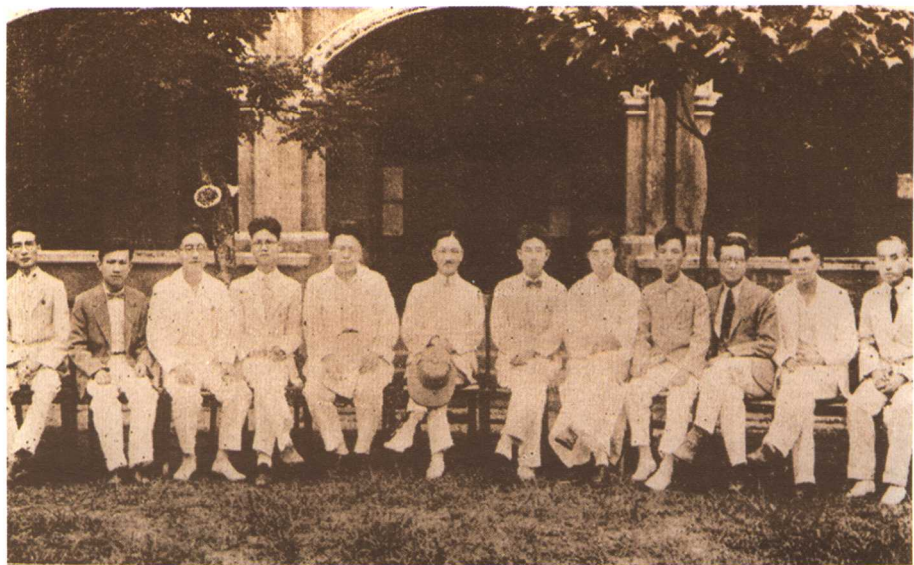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 钟敬文先生 (摄影: 侯艺兵)



●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人员留影。右第三人为作者（一九二八年六月）



● 去国留学，中国民俗学会在杭州部分同仁送别留影。
前排右为作者（一九三四年春）



◎ 接受中国文联“荣誉委员”聘任后留影（一九九七年）



◎ 与本卷编纂者连树声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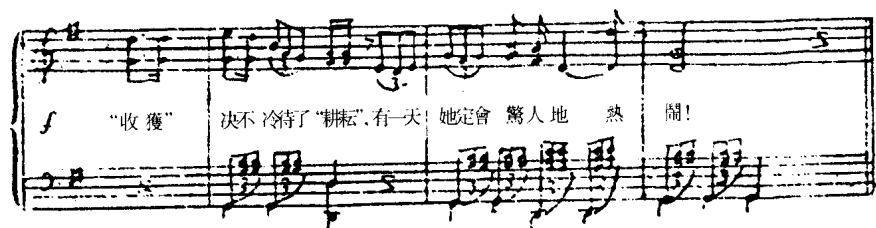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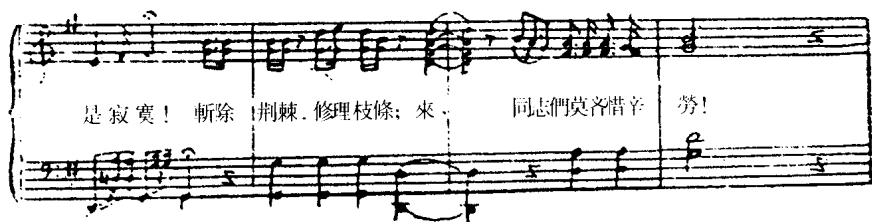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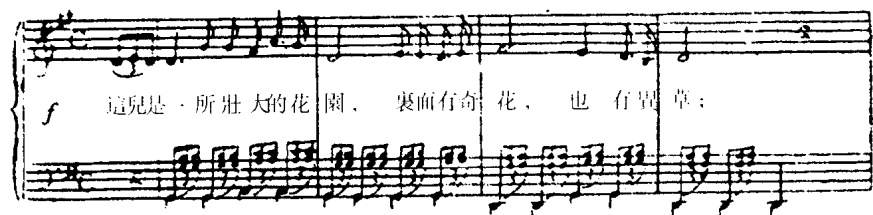
中國民俗學運動歌

moderato

健壯

鍾敬文 詞

程懋筠 曲



《钟敬文文集》顾 问

季羨林 张岱年 启 功

扉 页 题 字

启 功

本卷编纂者

连树声

责 任 编 辑

黄书权

技 术 编 辑

王 琳

出版说明

这套文集，比较完整地辑集了钟敬文先生生平的学术论著和文艺创作的绝大部分篇章。钟先生在学艺方面涉足颇广，从事的年份又相当长（七十余年），所写作已经发表或未发表的文字，自然不止于此。但是，重要的或在学艺史上与之有关的篇章大都已搜罗入集。

我们根据所辑文字的内容，大略分为五卷：

1. 民俗学卷；
2. 民间文艺学卷；
3. 诗学及文艺论卷；
4. 散文随笔卷；
5. 诗词卷。

如上所述，钟先生的学艺活动涉及人文科学的几个方面，并且所跨年度较长，在某些学科方面（如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他的研究还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比较完整地辑录他的著作，就成为保存这个世纪学艺文献的必需工作。

其次，钟先生的这些著作，在过去发表的各时期里，曾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和研究者们的高度评价。但过去发表的著作，大都比较零碎，使人颇有难窥“全豹”之憾。这套文集正是为了弥补这种缺憾而编辑、出版的，相信它会给读者和研究者以较大的方便。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为尽可能地保存这位世纪学者个人的语言风格及著述的历史原貌，除少数地方作了更动外，其余不作任何增删与修改。

以上几点，是我们编辑这套文集的主要目的，希望我们的实际工作，能够不辜负这种良好的愿望。

二〇〇二年十月

自序

一、在民俗学几个方面的活动

一般地说,民俗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研究民俗事象(包括有关理论)。但是,作为一种科学,民俗学的活动范围,除了这种任务,还有种种的其它方面。例如活动机构的建立,专业工作人员的培训,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专业书刊的编辑、出版,以及博物馆的设置,研究会议的召开,国际学术的交流……活动事项是繁多的。单从研究本身的结构体系说,既有一般性的研究,如理论民俗学、应用民俗学等;又有局部性的研究,如民具民俗学、工艺民俗学、语言民俗学、宗教民俗学、文艺民俗学等。就是一种局部性的民俗学,往往又包含着若干支学,如文艺民俗学就包含有神话学、史诗学、传说学、童话学(民间故事学)、谚语学等。

总之,民俗学虽然只是社会科学或文化科学中的一科,但它自身又是一个大系统,它包含着众多的小系统的学科。它应该称为“民俗科学”或“民俗诸科学”,如包括众多学科的社会科学、文化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等那样。像这样活动范围广阔的科学,一个学者(他不可能有三头六臂)要包揽齐全是不可能的。例如

美国的鲍亚士、日本的柳田国男，都是大师式的人物，他们不仅有优异的成就和巨大的影响，也有广泛的活动领域。但是，他们也只是在学科的某些重要方面扮演了出色的角色而已。以柳田来说吧，他所涉及的领域不可谓不广，但是，像民具学、民艺学等，他就较少注意到；至于国际学术（民俗学）的比较和交流等，就根本不在他活动的范围之内。总之，不但一个学者有他精力、性向和环境等的限制，就这门学术事业本身的繁重性来说，它也决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能力所能完全担负得了的。这可说是一种自然的限制，人类对它一时是不可能突破的。

在民俗学领域的活动，我虽然参与较早，并且能够贯彻始终。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限制，我也远远不能做到包揽一切的地步。平心说来，在这方面，我只是一个耕耘时间较长、涉及的园地较广的诚实的农夫而已。

历史不仅预先规定了我活动的舞台，也指定了我应该演和所能演的角色。民俗学的活动在我们这东方的文明古国，虽然有较光辉的发生、进展的历史，但是，从现代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中国古代许多关于民俗事象的见解和资料记录，虽然很有学术意义，但是，到底还近于一种“原史”性质的东西。我们比较严格的科学的民俗学史，似乎应该从近、现代算起较为妥当。^① 因为学科起步比较迟，许多重要的工作有待着手进行。而对这门学科十分热忱并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同志并不多（中间还有一些只开了个头或走了几步就停止了）。加之，我国学界与之密切相关的其它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原始社会史等，情况也没有好得多少。因此，我们这种科学，尽管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期，由于附着在北大、中大等官立大学校，得到

① 张汉东同志在一九九三年第二期《民俗研究》发表了《论汉代中国民俗学的形成》一文，所说值得进一步讨论。这里，我只依照学界的一般说法。

相当的发展机会,但好景不长,它们几如昙花一现——虽然影响是存在的。在上述那样的条件下,我们民俗学工作进行的艰辛就可以想见了。而我正是在那样的境况中挣扎和奋斗过来的。

我是一个天资平凡,而所处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都不是什么优越的学人。但是,从青年时代起就受了学界先辈和新兴学术活动的启发和影响,使我成为这门学问虔诚的信徒。我渐渐形成一种决心,要在我们这既贫瘠(主要指理论等)又丰饶或比较丰饶(指现实资料及历史遗产)的祖国学术土地上,建立这门科学的花林。因此,长时期以来,我尽力凭借一切能够利用的条件,单枪匹马或结合同志,在这土地上披荆斩棘,播种施肥,以促成它的生长和繁荣。这是历史课给我的庄严任务,而我不过是它勤谨的一个执行者罢了。

从二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一直耕耘在这一块学术土地上。在前面提到的本学科的那些活动领域,包括各种支学,由于某些客观条件的容许,有不少方面我是跋涉过来的,有的还忝当了倡导者的角色。为了有助于同志们的了解和自己的省察、检查,我试就一些重要方面的活动情形简述一下。

(一)关于搜集、记录及整理工作 在二十年代中期和后期,我就在收集、记录的基础上整理和出版了几个小册子,如歌谣集《客音情歌集》(一九二六年)、《登歌》(一九二八年)、《马来情歌》(一九二八年)以及民间故事集《民间趣事》(一九二六年),还做了古代歌谣的翻译和改编工作,如对清代学者、作家李调元主编、刊行的《粤风》的处理和出版(《俚 僮情歌》,与刘乾初烈士共译;又有对《粤风》所集瑶、汉、登等民歌的改编、注释本。后者有顾颉刚先生序。一九二七年)。此外,当时我还编过一部《两广地方传说集》,是以我自己征集和记录的稿子编成的,顾颉刚先

生给它写过序。但该书未刊行。^① 那些时期,我所搜录的口传故事,除了上述的《民间趣事》专集以外,还有一些单篇,分别发表于别的书刊上,近年才由张振犁教授收入《钟敬文采录口承故事集》出版(一九九三年)。此外,我还采访、记录了当时海丰境内峯族和疍民的生活、文化资料,发表在当时广东、北京等大学的学术刊物上(现在均收入本书)。

总的看来,我在民俗学资料的搜录、整理上,的确做了些工作。但是成果并不理想——它粗糙、简陋,距离严格科学的水平颇为遥远。但我在青年时代,凭着一股热情和仅有的一点专业知识、技能,在我国现代这门学问诞生的曙光时期,奋力做了那些工作。它不仅在自己学术生活的历程上是值得记忆的,就是对于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初期历史,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吧。

(二)关于专业活动机构的建立工作 在我开始从事这种学问的活动时,就有幸参加了这方面的专业机构,即北大歌谣研究会(当时它是唯一的这方面机构)。但我当时(一九二五年)远在广东,只是一个通讯会员而已。到了我第一次在中大工作的时间(一九二七年),就有机会参与了该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的建立和风俗物品陈列室的设置工作,稍后又主持了民俗学传习班的事务。中大民俗学会的建立,虽然后于北大歌谣研究会,但规模比较宏大,事业比较广泛,而且,首次把“民俗学”这个名词冠于学会名称之上,其意义尤不容忽视。我当时年纪还轻(二十四五岁),资历甚浅,但由于自己的热心和某些客观条件的便利,做了许多工作。它对于我以后这方面的活动起了建基作用。

在杭州,我们继北大歌谣研究会、中大民俗学会之后,建立

^① 此书稿,记得我离广州时,曾留在中大民俗学会,后不知下落。

了“中国民俗学会”。这个学会没有大学可依靠,经费、人手都很感拮据。但是,由于少数人的拼死努力,居然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书刊,博得了各地不少青年和民俗爱好者的响应(他们纷纷成立组织,出版书刊),一时形成了中国民俗学运动的第二次复兴的局面。这又一回使我领会到在推进一种新学术的活动上,专业机构的建立和运行,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全国解放后,民间文学、艺术,受到相当重视。我乘此机会,向文化部领导同志建议成立有关机构(第一次文代会开过后,我一时留京不南下,为的就是干这件事)。恰巧周扬同志等也有此意。我们于一九五〇年春天,建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即现在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它在我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领导与推动作用。但是,那些时期,作为整个学科的民俗学却遭到冷遇。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因为与其历史、社会有关,多少被记录一些下来(但当时没有正式发表)。至于广大地区汉族的民俗事象,却没有入去记录。研究民俗的学问,在思想批判中,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学术”的黑帽子。人民文化的敌视者“四人帮”好容易被打倒了!学界响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钟声。当时我想,那久被打入冷宫的民俗学该是解放的时候了!

由于历史经验的启示,我认为要新的社会基础上重兴民俗学,首先的一个任务,就是建立专业机构,联合同志,进行科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等工作。为了达成这种目的,一九七八年春夏间,我草拟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分头去请顾颉刚、杨堃、容肇祖、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几位同志签名,然后把它呈交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据说,当时在医院中的胡乔木院长见了颇感兴趣。在同年秋间,该院所颁发的应该研究的二十九种社会科学学科中,就列入了“民俗学”的科名。一九

七九年冬,全国文联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我们又将倡议书,通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公开发表。这样一来,重建这门学问及其全国性机构的倡议,就成了学界大部分同志的共识和心愿了。

接着,一些省、市的民研会,相继成立民俗学研究小组或地方民俗学会。经一定时期的筹划、经营,我们终于在一九八三年五月,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民俗学研究机构。接着我们又办了全国性的民俗学及民间文艺学讲习班,广泛地培训了一批青、壮年的民俗学工作者(他们后来大都成为本省、市这方面学术活动的骨干)。此后该会又举办了几次民俗学讲习班和研究会,普及了民俗学的知识,扩大了民俗学工作者的队伍并提高了他们的业务水平。到现在已有二十多个省、市成立了民俗学的地方学会,南北有不少高等院校设有这门学问的讲座或兼设有师生共同参加的民俗学社。

应该说,十多年来,这种学科的有关组织的发展是相当迅速和广泛的。这种局面的造成,除了客观条件比较有利外,就是由于广大学界同志学科意识的觉醒和认真努力。而作为老一辈的民俗学者,我们少数人曾亲自倡导、参与和不懈地推动这一学术运动(为了广泛建起地方的学会,我个人曾南北奔驰,口焦笔秃,借以鼓舞、推进地方同志们的活动),亲眼看到今天这方面发展的盛况,我虽然不敢妄自居功,却不免以自己曾经稍尽微力而感到欣喜和安慰。

(三)关于专业书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一种现代学科,它的专业著作、期刊等出版物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优劣,往往是衡量它是否发达的一个标准。北大和中大,在中国现代初期民俗学史上占有相当地位,那主要原因,就是它们出版了机关刊物和专业丛书。这是很明显的历史事实。

北大《歌谣》周刊时期,我还不过是一个积极供稿者。到了

中大民俗学会时期,我便成了编辑工作主要的责任者了。在一九二七年冬创刊的《民间文艺》(周刊),开始时的编辑者,是董作宾先生和我。但不久,他就被派回河南去调查殷墟出土古文物及作考古发掘的预备工作了。责任就落在我个人肩上。该刊出满了十二期,改为《民俗》周刊,从第一期到第二十四期都由我个人负责编辑(名义上的主编人是顾颉刚先生)。在这两个刊物的编辑上,约稿、写稿、审稿、集稿等事务不用说了,连送稿到印刷厂,去会计处取钱付印费等事务也都由我负责去做。此外,如民俗学丛书,那最初十多种的付印,也都是我经手的。

当时中大文学院教师人数不少,比较热心于民俗学的也不是没有人。但他们一来教务较忙,而且住得离学校远些,非上课时间不常到校;又有不少的“外江人”,不大懂粤语,事务交涉有困难。于是,那种重担就只好由我来挑了。好在我当时年纪较轻,又是本省人;更主要的,是自己正热衷于这门新学术,所以就挺过来了。现在回想这六十多年前的往事,虽然心里有些不敢相信,但是,自己却确实在这新学术的初建期,是尽了个人所能尽的力量的。至于那些工作的实际价值究竟如何,就只好让公正和有见识的学术史家去论定了。

在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时期,我也参与了许多编辑、出版工作。最初我们编辑了《民俗周刊》,是附在当地报纸《民国日报》上出版的。该刊由我和钱南扬先生(当时他和我都是浙江大学中文系的教师)负责。它刊行时,姜子匡还没有到杭州,中国民俗学会也还没有正式成立。第二年(一九三〇年)学会宣告成立(跟中大民俗学会一样,都没开过正式的成立大会)之后,为了开辟文章发表园地,扩大学术影响,我们跟绍兴一个刊物(《民间》)的编刊者合作(后来该刊署名三位编辑中的陶茂康,即原刊的主办人)。这个刊物每月出一期,兼载理论和资料,不少国内学者

供给稿子,有一定的声誉。稍后,我们编刊了《妇女与儿童》,性质大略与《民间》相同,曾刊出了几个专号。

这时期我们编刊的出版物里,较受学界重视的,是两册《民俗学集镌》(第一册,原为《开展》月刊的《民俗学专号》,“集镌”的名称是后来追改的,目的在使与第二册一致)。它们以理论为主,兼收一些记录资料。我们约了一些著名学者执笔(如顾颉刚、周作人、黄石、钱南扬等),也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有一定分量的文章。出版后,学界评价颇高,对我国当时处于低潮时期的民俗学活动,起了振作、鼓舞的作用(《民俗学集镌》,近年来上海文艺出版社有影印本)。

一九三四年春至一九三六年夏,我在日本时期,并没有忘怀国内的民俗学活动。我为《艺风》月刊编辑了《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专号》及《民间文艺专号》,用图片、论文、随笔及记录资料,宣扬、普及了民俗学等学科知识(此两号,其一,近年已经影印重版,另一也将影印发行)。同时,我又在该月刊上附出了《民俗园地》,^①共刊了十期,算是置身海外的游子对国内这门学术的供奉。

一九三六年夏,回到杭州,继续着我的教学和研究活动。我为民教实校的《民众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及《民间风俗文化》两个专号,和两册民俗学小丛书。为配合我们举办的民间图画展览会活动,我编辑了一个《民间绘画展览会专刊》,除收录了几幅民间木刻、绘画之外,还载有许钦文、施世珍和我自己的文章。这是我国民间图画较早的收集、展出和评论的一次活动,是值得学术界纪念的(近来已经有人把这次展览会作为我国现代学界重视民间美术的一次有意义的学术活动而记载入《中国美术史》

^① 近年有些学者,把《民俗园地》算作中国民俗学会刊物,其实不确。它虽由我主编,但与学会无关。